

# 大院里的晋商

乔忠延

晋商立足山西,向外辐射,几乎遍及神州的每一个地方。灵石县王家、祁县渠家、太谷县曹家,都把生意做到了京都。

不仅在北方淘金,晋商下江南的也不少。祁县渠家在湖北羊楼洞、羊楼司、咸宁等地收购茶叶,购买茶山,种植和加工茶叶,行銷国内外,甚至走海路运往欧洲。货物向四方发散,财富向渠家汇集。渠家大院就建造在祁县城里,40座院落鳞次栉比,高峻威严,透出森然气象,人称“渠半城”。在别处四进院落很少看见,渠家却拥有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错落有致;悬山顶、歇山顶、卷棚顶、硬山顶形式各异,主次分明。“渠半城”浓缩着中国古建的诸多精美元素,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博大神韵。

太谷的曹家文化底蕴深厚,不像别的大院姓氏就是名号,曹家大院的名号则是三多堂。三多堂,哪三多?多富、多寿、多男子。这显然出自华封三祝的典故。曹家要三多,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先祖曹三喜没有和诸多商家争夺客户和市场,而是别开蹊径,独闯关东,做买卖、开店铺,商号遍及“关外七厅”。“关外七厅”是清水河、丰镇、托克托、萨拉齐、和林格尔、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和宁远。后来跨出国门,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西到巴黎、伦敦,把国内的茶叶、布匹输往国外,引进日本的钢铁、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据1938年统计数字,曹家经商几百年,商号发展到640多座,仅雇员就有3.7万人之多。太谷人说“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不少小户人家的子弟,都跟着太谷商号“飞翔”,并从中获利致富。

每一座晋商大院都凝结着缔造者的胆识和智慧,折射出时代的特征。晋商的崛起有两个关键因素,明代实行“开中制”和清代开发边疆,都催化了晋商兴盛。灵石县王家便是顺势而为的一个典型代表。清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反叛,他的干儿子、陕西提督王辅臣随即作乱。王家兄弟谦受、谦和正好购得24匹骏马,立即无偿上捐,博得山西援剿提督陈一炳的信任,委托他们担负筹运军需的重任。叛军平息,银两广进,王家大院得以扩建。后来一扩再扩,清乾隆四年(1739),在东山梁上扩起“恒贞堡”,亦称“红门堡”;清乾隆十三年(1748),向南扩建“凝固下堡”。之后,又扩建“和义堡”“拱板堡”“视履堡”和铁门院。王家把战争



渠家大院(来源:百度)

的防御思维带回家乡,代代相传,筑堡成院成家,在古代民居中独树一帜。

万荣李家则借助了汇通“三边”的良好机遇。“三边”,即靖边、安边、定边。这一带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能种植棉花,土布缺少,价格很高。李文炳看到了这个商机。清道光三年(1823),在家乡收购土布,组织马帮,运往“三边”。再把西北的皮货、药材贩回内地,财源滚滚。李家商号先是向西拓展,而后向东、向南挺进,发展到武汉以及沿海的上海、天津等地。100多家店铺,覆盖了15个省市、40多个县。据说,李家媳妇王和君接手“敬义泰”生意后,每年巡查各地商号,从闫景村坐马车出发,每天行程60里,只住自家店,不吃别人饭,可以直到银川城。

走遍山西大院,唯有李家大院别开生面。那门楼外形轮廓,不仅高,不仅仅直,而且还尖,似乎直冲青天。这线条如此轻快,这造型如此挺秀,确实少见。是少见,这是十六世纪欧洲“哥特式”建筑体式。别看这“体貌”像是洋

人的个头,外在的“服饰”却是本土特色。砖雕的大善字是传统的,砖雕的图案花纹是传统的,这不就是立体的中西合璧、文化融合吗?毫无疑问,李家大院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整座大院渗透着博采众长的理念,北方屋舍的本色里,夹杂着一些徽派元素,夹杂着一些欧洲风格。其特点是,精致大宅门通天接地,传统四合院藏风聚气,欧式风格渗透形体,徽派样风味增添情趣。

李家大院的新异,在于李家传人李子用曾经留学英国,把西式建筑风貌带回了家乡。何止是带回了西式建筑,还带回了英国媳妇麦克蒂伦,带回了工业时代的新思维。李子用着手办起炉院,铸造五齿饼、风齿饼、柳叶饼等新型农具,铸造笼圈、铁锅、鏊子、篦子等新式灶具。这还只是小打小闹的尝试,继而李家在上海、天津、武汉的申新纺织公司、中纺公司、大华纱厂也相继开业。

那个时代的晋商步履,不只是遗留在史料里,故乡的大院里也垒砌着不可磨灭的印记。

## 昔日太原“元旦”

彭庆东

“元旦”,在民国以前,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春节”,是一个非常中国风的节日。

根据《说文解字》可知:元者,始也;旦者,明也。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个早晨。据说,“五帝”之一的颛顼确定农历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合称“元旦”。虽然此后夏、商、周等朝代对于把“元旦”放在哪一天各有所好,但还是以每年的第一天为准。直到汉武帝时,元旦才被固定为农历的一月初一,之后到民国元年一直未变。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处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为公元1912年1月1日,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称号,挪到了公历1月1日,后又将旧历年改称为“春节”。因此,1912年1月1日就成了中华民族迎来的第一个公历年。

公历年对于传承了上千年农历习俗的民众来说,是个新鲜事物,如何才能让人们接受并沿用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元旦放假,商家促销”。公署机关带头放假,社会团体放假,然后银行放假,学校放假,有放假三天的,也有两天的,并不统一。放假期间,公署还张灯结彩,举办宴会,等等。

虽然官方极力为民众营造分享阳历年快乐气氛,但民众并不买账,甚至视元旦为“洋节”,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著名地方史学者、太原晋源区赤桥村的刘大鹏先生就在其日记里多次记载了太原当地民众对元旦“喜旧厌新”的情景:对于新历,在官人往往挂红结彩,休假致贺,而民间却不以为意,令刘大鹏深感“民情不顺逆”;而每逢旧历年,民间则家家户户无不按照旧俗,大张旗鼓地庆贺新年,仍旧“鸡鸣而起,爆竹燃香,张灯结彩,迎神逐祖,虔诚祭祀”,场面热闹,灯火辉煌,宛若白昼,初七唱戏、初八开市等“旧年之事”也依旧遵行不废,以致“各处官长亦皆无如之何,听民之仍旧度年也”。

这让民国政府很是尴尬,于是在1929年初颁布禁令,禁止所有人过农历春节,并把祭祖、年夜饭、敬财神及元宵节等活动统统挪到阳历1月。刘大鹏的日记也记载了当年太原那个春节的情形:“今日元旦,只闻寺庙敲钟报晓,庆贺新年,不闻街市纸炮之声,由于省城警察厅致各县公文,禁止民间燃放纸炮以及一切炮仗也。”其结果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官界皆行阳历,民界皆仍为行阴历,以寅月(正月)为岁首。”这里所说的“元旦”仍是指农历的春节,除了寺庙的报晓钟声,太原的乡村寂静无声。显然,禁令过于激进,弄得元旦、春节两

不愉快。1934年,民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这项禁令,元旦、春节各过各的,互不干涉,这才彻底形成了元旦和春节“分家”的局面。1935年出版的《太原指南》即是这样记载:“太原俗尚,新历年,仅机关学校放假,一般商民,应用者较少,故风俗多沿用旧历。”

面对早先元旦、春节的“纠结”,商家则“犹抱琵琶半遮面”,既不得罪官面,也不结怨民俗。起初逢阳历元旦,商家用阴历贴春联的习俗来庆贺,广告也仅冠以本店名号向大众“恭贺新禧”,抑或宣传一下本店所售的商品,以此应付一下“庆贺”场面,却很少有与新年元旦挂钩的降价促销活动。直到1927年,阳历元旦才迎来了大规模促销的商机,其促销策略与今日无异,但阳历元旦却登上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广告宣传画。商家把广告宣传画制作成精美的日历,正面的商品多辅以时髦女郎为背景,背面按序排列了民国年号、公历及阴历等日期,时人称之为“月份牌”。月份牌随商品免费赠送,刺激人们消费的同时,也让新年元旦渐入人心。

烘托新年元旦气氛的还有数戏剧“贺岁档”。民国之初亦有“贺岁”戏,只不过“贺岁”戏所贺之岁还是阴历,打广告所用的日期也是阴历。当阳历元旦被世人所接受之后,戏剧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贺岁档”,这对太原戏剧繁荣无疑也是一个福音。元旦之夜,各大戏班子的名角大腕纷纷亮相于省城的茶楼、戏园,这比大年三十可红火多了,因为大年三十太原人都围炉守岁,没有演戏的,也没有出门看戏的;有的戏园专程邀请外地名家来太原演出,1934年的元旦节刚过,著名京剧艺术家李万春就应邀来太原公演十天,延续元旦“余热”,位于柳巷的中华大戏院门前一票难求,可见太原票友们对“贺岁档”的痴迷热情。当电影传入太原后,具备放映条件的也就三四家电影院,虽说普通民众看电影相对于看戏听书来说还是高档消费,但上座率仍然可观。即便如此,元旦之日,位于南仓巷的山西大剧院还要刊登电影广告,并赠送电影明星画报,图的就是影院门前的红火热闹。“贺岁档”增加了人们过新年元旦的快乐感和仪式感,也增加了人们对新年元旦的认识。

尽管百年前的老太原人对元旦认识有差异,但并未影响大家憧憬美好生活,新年代表着希望,过两个新年又有何妨!

## 永济饺子



晋之味

我们村是晋源区五府营村,村东原有一条大河,此河呈南北走向,但却曲曲弯弯的,从南屯到野庄、王郭村,绵延几十里,人们称其为县河。河堰厚实高大,长满了树木杂草,平日里栖息着野兔、獾子、野鸭等动物。

既称县河,便可知是当初县衙门主持开凿、造福全县人民的水利工程。据老人们说,县河开凿于明代。那时候,土地都是个人所有,开新河是要占用土地的,占谁的地谁不高兴。县令便按那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派上衙役,骑着马,从设计的河头跑到河尾,留下马蹄印处即是河道的中心线,叫做“跑马征地”。听天由命,谁有意见也没办法。征地的日子是预先通知下去的,到了那天,家家户户都有人守护着,马跑过来了,人们就尽量把马赶离自己家地头,于是那马就左冲右突地一路跑下去,便跑出了这条曲里拐弯的县河。

还有一个小插曲:县河是从南屯村之东的汾河进水,马当然是从那儿开始跑。谁料刚开跑,有人就赶,马猛不

李海清

防受了惊吓,应该是往南跑却调转头朝北跑去,绕了一个大圈才被骑马人拢回来往南跑,于是县河的河头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弯,叫做“马回弯”。

如此关系全县国计民生的水利工程,每年的清淤便也成了大事。这项工作按沿河受益农民种地亩数的多少摊派挖河工,挖河的人称为“民夫”,挖河便被称为“走夫儿”。县河漫漫几十里,每年挖河时,分到哪一段就是哪一段,往往分到的河段离本村有二三十里。那时交通不便,民夫们全靠两条腿走路。可以想见,每年秋天的某段日子,天还没亮,民夫们就从炕上爬起来,吃饱地、硬硬地吃上一顿早饭,再往筒子腰带里装几个窝头、饼子当干粮,往腰带里一塞,把铁锹往肩上一扛,成群结队地出了村,然后呈一线形,鱼贯走在县河河堰上,赶往所分的工段。

因此,挖河便成了一个有着很深内涵的文化现象,产生了传说、故事、歌谣。“出门三步,干粮入肚。”这是一种经验,漫漫长长的

路,走得已经很累了,赶到工地前把干粮吃掉,正好有力气挖河。民夫们说的“早吃干粮力气在身上,晚吃干粮力气在嘴上”,正是这个道理。

“苇根树根菅草根,看时看时一房深,就算你是好后生,一段河挖得你肚脐疼。”县河要穿过大片的苇地,河道里有多年的老树根、老菅草根等,这些根很有韧性,很难挖,除需要力气外还需要经验和技巧。民夫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一锹又一锹,把淤泥一块一块地甩上一房多高的河堰,还有来回几十里的路要走,劳动的强度可想而知。自然也有人体力不支败下阵来,这时,“河头”便来“雇夫儿”,即领着人来挖你所分到的河段,你出钱就行。如果你不同意“雇夫儿”,但到了收工的时候还没有挖完,河头就来“截夫儿”,即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要再去挖了,掏钱吧。

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了汾河西干渠,县河才完成历史使命退役了,但渠堰还在。七十年代初平田整地,县河堰才被摊平,彻底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金朝末年,蒙古大军南下,金朝的中都(今北京)已经不适合再作为都城了。到了金贞祐二年(1214),金朝大臣中主张迁都的呼声很高,有人建议迁都河中(蒲州),因为河中地区背负关陕五路,土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台以为右翼;前有绛州、平阳、太原三大镇,敌军不敢轻入;让三镇郡县之民皆据守山寨,在敌军进攻时,昼夜夜劫;屯重兵于中条山,朝廷在河中城有完全之固。因此,迁都河中具有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后来,有人认为河中城靠近黄河,又没有现成的宫殿建筑,所以建议把都城迁往汴梁。从当时的迁都之议,可以看出河中城重要的军事价值。

金朝迁都汴梁后,对河中的防御十分重视,金贞祐五年(1217)前后,诏令元帅都监阿禄带驻守河中。阿禄带不善带兵作战,在河中城外修筑了许多战壕。北面的绛州城破之后,阿禄带十分害怕,上奏朝廷说河中孤城不可守,不要留下来给了敌军,建议实行焦土之策。结果,阿禄带下令放火焚城,大火烧了两天。当时金朝准备放弃河中城,要把这一带的百姓迁往陕西。金兴定三年(1219),大臣完颜伯嘉到河中,他认为河中城为一方重镇,国家的基本所在,不应放弃河中,上奏折说:“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一失之,恐未易取也。”“河中、晋安(绛州)披山带河,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今虽残破,形势犹存,若使他人据之,因池之饶,聚积兵粮,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他认为一旦失去河中,将会失去太行山以西的整个河东地区。金宣宗十分后悔当初放弃河中之举,下令将阿禄带拘捕下狱,命令抓紧时间修复河中城,但后来不断被蒙古军队攻破。

从公元1218年到1222年,蒙古名将木华黎在河东各地到处征战,几乎占领了从北到南的主要城市,金人的河东屏障尽失。木华黎于金元光二年(1223)去世后,金人为了恢复河东屏障,从1223年到1229年进行反击,收复了平阳、霍州、泽州、潞州、太原、忻州等军事重镇。金正大七年(1230)窝阔台即汗位,开始灭金总攻击,被金军收复的地方又易手到蒙古军队。

公元1222年后,河中城在金军和蒙古军队之间数易其手。当年十月,蒙古军队在攻取荣州(今万荣县西)、临晋(今临猗县西)之后,向河中城进攻,蒙古军队在金军河中守将侯小叔出城议事之际,攻陷河中城。蒙古军队认为此城为河东要地,任命石天应为兵马都元帅,守镇河中,太原、平阳等地的蒙古军队都受石天应的节制。第二年正月,侯小叔率兵从中条山出击,准备收复河中城。石天应派遣骁将吴泽出东门,埋伏在两谷之间,企图伏击侯小叔。不料,吴泽嗜酒,夜间喝醉了,在山谷睡着了,侯小叔由小路直奔河中城下,在城墙上挖坑登城,焚烧城楼,城中的蒙古守军仓促迎战。第二天中午,石天应战死,金军又占领了河中城,侯小叔下令烧毁黄河上的浮桥。在这次河中争夺战中,历史名楼鹳雀楼也被焚毁。

很快,蒙古军队十万人马又进围河中,金朝派两支援军救援河中。侯小叔和援军约好,夜间鸣钲(钲,古代乐器,形似倒置的铜钟,有长柄)为号,内外呼应。到了约定的时间,侯小叔从城内出击,但城外的两支援军却不敢出击,侯小叔只好又率众回城。几天之后,河中城又被攻陷,侯小叔战死。五月,金军又占领了河中城。

在前后八个月的时间里,河中城被金军和蒙古军队反复拉锯攻占,期间四次易手,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可见双方对此地的重视,视为必争之地。

金正大八年(1231)九月,窝阔台率领蒙古大军围攻河中城,河中告急,金朝第一次派出的救援军队怯战,没有到河中就返回去了。后来金朝另外派遣一万部队救援。两位皇族——草火讹可、板子讹可领兵三万驻守河中城。因为蒙古军来势凶猛,城中守军兵力不足,只好把城内一分为二,据守半边。蒙古军队在城外建起二百尺高的松楼,又垒起土山,并挖掘100多条地道,形成地上、地下的立体攻击体系,全力向河中城进攻。城内的金军拼命抵抗,史载“军士殊死斗,日夜不休,西北楼橹俱尽”。打了两个月,蒙古军队才将河中城攻破。

从公元1217年前后,金军第一次焚烧河中城开始,到1231年金军彻底从河中败退,十余年间,河中城饱受战火摧残,不但城楼被烧毁,古城附近建于北周时期的鹳雀楼和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黄河浮桥都被焚毁。鹳雀楼和黄河浮桥,对蒲州古城具有象征意义,不仅是一方之名胜,更是盛唐文化、中原文化的象征。五十年后,元代著名诗人王恽来到蒲州,慕名拜谒鹳雀楼遗迹,写了一篇《登鹳雀楼记》,不过,他所登的是鹳雀楼的遗址。他在文章中说:“……于是俯洪河,面太华,揖首阳。虽杰观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伟,云烟之胜,不殊于往古矣。”他认为,虽然没有了鹳雀楼,但这里还有“河山之伟,云烟之胜”。

在金末战争中,因为河中的战略地位重要,金蒙双方在此争夺了十多年。河中重镇不失,金朝尚可喘息一时;一旦河中不保,金朝失去了屏障,很快就走向灭亡。

**结束语** 本版“黄河战事”专栏于10月13日开始,陆续刊发了李广洁先生撰写的文章,介绍了数千年间发生在黄河两岸的重大战役,反映了黄河作为山西之襟带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其对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黄河战事”专栏今日结束,感谢各位读者的关注。

——编者

## 黄河战事

金蒙河中之战 李广洁